

音乐家

朱秀海 著

修订版

作家出版社

人性的搏击与心灵的悲歌
战争与人性的交响乐



朱秀海 著

音乐唐

修订版

人性的搏击与心灵的悲歌
战争与人性的交响乐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音乐会/朱秀海著. - 修订本.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 - 7 - 5063 - 5759 - 3

I. ①音… II. ①朱…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6250 号

音 乐 会 (修订本)

作 者: 朱秀海

责任编辑: 罗静文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 zuojia. net. cn

http://www. zuojia. net. cn

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590 千

印张: 36

印数: 001 - 30000

版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759 - 3

定价: 3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人 物 表

- 金英子 朝鲜籍烈士孤女、格节游击大队及抗联十六军女战士
- 秋雨豪 格节抗日游击区创始人、抗联十六军军长，后牺牲
- 赵尚志 抗联三军军长、北满抗联总司令，后牺牲
- 汪大海 格节抗日游击区创始人、抗联十六军副军长，后牺牲
- 秋 云 秋雨豪之妹、汪大海之妻、格节游击大队女战士，后牺牲
- 赵玉珠 秋雨豪之妻、格节游击大队女战士，后牺牲
- 霍小玉 格节游击大队女战士、烈士孤女，后牺牲
- 老邵头 格节游击大队炊事员，后牺牲
- 卞 霞 抗联十六军女战士，后牺牲
- 邱 梅 抗联十六军女战士，后牺牲
- 安福顺 抗联十六军女战士，后牺牲
- 胡秀芳 抗联十六军女战士，后牺牲
- 张“老爹” 抗联三军独立三十二团团团长、邱梅之夫，后牺牲
- 胡爷爷 地下交通员、抗联十六军后方密营管理员，后牺牲
- 胡奶奶 地下交通员、胡老爹之妻，后牺牲

松下浩二 日军俘虏、格节游击大队和抗联十六军战士

中井弘一 日军驻格节地区司令官，战犯，日本战败后自杀

河原信行 日军驻格节地区继任司令官，战犯，获释后死于 1972
年中日恢复邦交之际

目录

正 篇

- 第一天 / 2
- 第二天 / 27
- 第三天 / 87
- 第四天 / 123
- 第五天 / 179
- 第六天 / 240
- 第七天 / 268
- 第八天 / 331
- 第九天 / 350
- 第十天(录音 I) / 389
- 第十一天(录音 II) / 493
- 第十二天(大结局) / 547

附 篇

- 给局领导的正式报告 / 558
- 附件一 我某驻日机构给某局老干处的复函(摘要) / 561
- 附件二 有关抗联十六军情况的简略说明 / 564
- 日记一则 / 565
- 留给自己的秘密录音文档 / 567

正 篇

第一天

1

“可以开始了吗?”

“可以。”

我不是中国人。我是韩国人，1919年生于汉城。父亲是一所大学的日语讲师，母亲则在一家颇负盛名的乐团里担任小提琴手。

父亲是在一场乐团为母亲举办的独奏音乐会上认识母亲的。那天父亲是个普通观众，他与其说是一见钟情地爱上了母亲，不如说是爱上了母亲用手中的小提琴演奏出的美妙音乐。

父亲不懈地追了母亲三年。那三年里，母亲每一次演出结束后，都会收到他亲手送上的一束鲜花。父亲还是个诗人，这三年间每天为母亲写一首诗。他的炽烈而持久的爱终于征服了母亲的心，使她不顾家庭的反对，坚持和这个一无名气二无家产的大学教师结了婚。

“你真的准备好了，要听我一直讲下去?”

1910年，中日甲午海战后实际占领了朝鲜的日本，强行宣布与我国“合并”。说是合并，其实就是吞并。朝鲜民族是个不屈的民族。他们为光复故国组织起来，展开了英勇的反抗。我的父亲成了秘密组织“光复社”的骨干成员，积极参与对日本占领军的袭击、暗杀活动。后来，他还成了组织里的一名暗杀专家。

父亲做这些事一直瞒着母亲。作为一名优秀的青年小提琴演奏家，母亲正逐步接近自己事业的巅峰。母亲醉心于自己的不断成功，竟有两三年时

间对父亲做的事情毫无察觉。

大约是在日本人吞并朝鲜三年之后，具体日期我记不清了，根据所谓“天皇谕旨”，日军占领当局开始对整个朝鲜民族实行文化灭绝，他们逼迫朝鲜人不说朝鲜话，只说日本话，勒令所有的音乐团体只能演奏日本乐曲和西洋乐曲，不得再演奏朝鲜乐曲。母亲所在乐团全体人员在同一个夜晚秘密宣誓加入“光复会”，并拒绝演出。像父亲一样，母亲投入“光复会”的秘密斗争时也没有告诉自己的爱人，她的初衷也是要保护父亲。

父亲和母亲在组织里相识于一年之后。当时父亲接受了一项从中国边境偷运军火的任务，上级给他派来一名女会员，以妻子的身份配合他行动。到了会合地点，父亲发现组织上派给自己的“妻子”，就是我的母亲。

1920年夏天，我还不满一岁，“光复会”在汉城的秘密机关被日本特务破获，几名重要成员被捕。这一秘密组织的最高领导层一不做二不休，决定动员全朝鲜人民举行反日大暴动。一夜之间，南到釜山，北到鸭绿江边，上百万人拿起各种武器，向日本占领者展开了大规模攻击行动。整个朝鲜，到处是暴动者的大旗，到处响彻着朝鲜人不屈的歌声！

日本人血腥镇压了这场著名的大起义。他们攻击参与暴动的义军，并借机向誓死也不愿屈服的全体朝鲜人民发动了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暴动失败。义军被杀者上万，和他们一同殉难的同胞则没法统计。父母亲身份暴露，被迫随着一批侥幸逃脱的义军越过中朝边境，以难民身份流亡到了中国东北。

1922年冬，在中国东北流浪了近两年的父母改换姓名，带我在名城大连定居下来。父亲在一所朝鲜人办的中学教日语，母亲冒充中国人，加入了当地一个由旧军阀出资创办的乐团。同年，我弟弟英男出世。

这年我三岁，我们在市郊的家很快成了亡命中国的朝鲜“光复会”志士聚会的秘密场所。一到周末，我们家的小木头房子里就会来一些和父母亲同样年轻的叔叔阿姨，他们带来自己的乐器，以举办小型家庭音乐会为掩护，商讨、争论一个又一个光复祖国的计划。这些计划多半是一些空想，但其中之一却在我们到达大连一年后被实施了。这个计划是：在流亡中国的“光复会”成员中组织敢死队，分批潜回朝鲜，像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那样，对驻朝日本达官显贵展开大规模暗杀活动，为此他们自己不惜牺牲生命。我父亲是这一计划的制订者又是第一批实践者。1923年秋，我不满四岁，英男

两岁，父亲朴雄哲和一位名叫安荣光的叔叔就作为第一批敢死队员，回国去执行暗杀新任日本驻朝鲜总督的使命。

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那个秋天的黄昏父亲和我们一家离别的情景。我那年轻的父亲高大伟岸，他和安荣光叔叔背着简单的行囊，走出家门，沿着海边的沙滩向市区火车站方向走。他们将从那里乘车去安东，再化妆偷越国境。母亲一手抱着英男，一手拉着我，跟在父亲身后，为他们送行。四岁的我已经记得很多事了，我以为父亲不会再停下来回头望我们一眼了，可是走着走着，父亲仿佛突然想到了我们，站住了，让安荣光叔叔一个人往前走，他慢慢回转身，一步步踏着沙滩走回来。母亲也像是突然醒悟了，带着我和弟弟飞奔过去！父亲一个个地亲了我和英男，然后和妈妈紧紧拥抱在一起。父亲再次对妈妈重复他出门前说过的话：“顺姬，我和安荣光很快就会回来，不管成功与否，不出半年就会回来。我们一家人很快就会团聚……”父亲说一句，母亲就点一次头，她什么话也没有说，可是她的眼睛在说：“我知道。我相信。我和孩子等着你！”

父亲走了，最后留在我记忆中的的是一个高大的背影。夕阳西下，海面半噙着落日，天地间金灿灿一片，一些动荡不宁的波光在母亲脸上和眼睛里流动。母亲那时只有二十七岁，母亲在我眼里年轻又美丽，痛苦又刚毅。母亲一定比我更清楚地记住了这个黄昏，记住了父亲临行时说出的话。四岁的我依偎在母亲身边，心头涌起的却是另外一番苦涩：从现在起，我没有爸爸了。这个感觉那么强烈，对我幼小的心灵的冲击那么大，以至于当父亲的背影终于从我的视野中消逝的一瞬，一直沉默的我突然嚎啕大哭起来。

我哭了很久。朦朦胧胧地，我在自己的生命中第一次感到了恐惧。我说不清楚它来自哪里，却知道它巨大而且不可抵御。我的身子骨一向不结实，当天夜里就发起烧来。母亲在床前守了我一个星期，我又能起床了。可是以后几年间，我的身子再也没有强壮过。

爸爸走后一段日子里，妈妈和我陆续听到过他的一些消息：他和安荣光叔叔安全越境，抵达汉城，和留在那里的“光复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组织了一个暗杀小组，成功地进行了对驻朝日军司令部参谋长久保横二的炸弹攻击，虽没将久保炸死，却炸掉了他一只胳膊。这件事打破了“光复会”起义失败后国内万马齐喑的局面，在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朝鲜人心中重新燃起了民族复兴之火。一年后，妈妈听到了从国内传来的新消息：爸爸让人捎话

给她，他现在的环境太不稳定，太危险，不能如约接我们回朝鲜团聚。爸爸要妈妈继续带着我们待在大连，一有机会，他就会到中国来，接我们回朝鲜。

妈妈接受了这些关于爸爸的消息。你听清楚了，我说的是“接受”。也许早在爸爸决定冒险回国的时候，她就想到爸爸一旦离去，归期就不再是她甚至爸爸自己所能料定的了。但是这些消息到底给她、也给一天天长大的我带来了安慰和在异乡生存下去的勇气。我们的亲人不能回来，可我们至少知道：第一，他还平安地活着；第二，他正在英勇地履行自己为国战斗到底的誓言。还有，即使他身在祖国，处境凶险而艰难，却从来没有忘记过我们。我们和他虽然天各一方，却在思念中相互支撑，给对方和自己以力量。时光流逝，爸爸的消息越来越少，但在我们寄居大连的日子里，这些消息到底没有中断过，它们不知不觉给了妈妈和我这样一种信念：爸爸总有一天会回到中国来找我们，或者托人接我们回去。我们终究要胜利地团聚在一起，只是那个日子还没来到！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我看得出来，无论妈妈多么坚强，爸爸的离去也像是在她心里豁开了一道伤口，妈妈的心在流血。她毕竟是个女人，一个送丈夫上了战场的妻子。妈妈用苍凉激烈的琴声缓解内心的痛苦和压力。在一些最难承受的时刻，妈妈用自己从朝鲜带出的小提琴拉起一支又一支曲子。我不知道这些曲子的名字，可我知道她是为爸爸也在为自己演奏。我生长在动荡不安的岁月，还在襁褓里就熟悉了作为一名出色的小提琴演奏家的母亲的琴声，她通过琴弦上流泻出的乐句裸现出的火焰燃烧般的内心。妈妈的琴声时而悲婉凄凉，时而激烈慷慨，思念和对胜利、团聚的想象成了妈妈琴弦上不变的旋律，它就像一只精灵，日日在我们这个小小的三口之家、在我幼小的心灵中飞翔。无论醒里梦中，我的耳边和心头回旋着的都是它那双无所不在的翅膀扇动出的嘹亮的颤音与和声。

爸爸走后七年里，乐团和剧院的后台成了我和英男的另一个家。妈妈一直在那个乐团做第二小提琴手，无论是排练还是演出，平时她都不愿意留我们在家里。她在舞台上或是排练场内演奏，我和英男就蜷缩里后台的一角，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地聆听他们的演奏。这样的童年，让我很早就知道了一个乐团的几乎所有秘密，认识了那些长长短短奇形怪状的乐器，我还似懂非懂地知道了许多音乐知识：独奏，合奏，旋律，变奏，对位，和声，知道了圆舞曲，小夜曲，奏鸣曲，赋格曲，独唱，合唱，贝多芬，勃拉姆斯，格

里格和他的《天鹅之死》……音乐的精灵日日夜夜在我幼年的灵魂里风中秋叶一样盘旋飘荡；又像山中的冷泉，点点滴滴，在一块还没有镌刻上多少生命记忆的青石板上敲打出动人的印痕。

1929年夏天，一个做全球巡回演出的欧洲著名皇家乐团来大连演出，只演出一场。一位富商小姐将自己的两张票送给妈妈，让她带我去一起欣赏演出。在那个灯火璀璨、花团锦簇的晚上，我平生第一次见识了当时世界上最负盛名的乐团指挥和演奏家，聆听到了他们的演奏。今天我已不可能说清那天我到底都听到了什么曲子，可我却记住了他们的演奏给予我的整体印象——另一个世界的印象，人不在人间而是步入了天国的印象，没有战争、侵略、反抗、仇恨、杀戮、屈辱，没有骨肉分离、思念、悲伤、担忧和眼泪，有的只是和平、宁静、欢乐、感动、喜悦……它们只是一些音乐，却由于艺术家的演奏化为全部的现实，让我们像是漫步在天国的花园里一样宁静而又欢悦。我被这场似乎再也不会结束的音乐的盛筵迷住了，像父亲离家那天朦胧地感到恐惧一样深深地震动了。我的心狂喜，我为自己今天这么近地发现了一个如此美丽的人间而又完全不同人间美丽的世界无声地哭起来。

那天晚上也是妈妈生命的节日！妈妈坐在那儿，两眼湿润明亮，脸颊上如同起了大火，妈妈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陶醉，也更加美丽。音乐会结束，妈妈带我回到家里，可无论她还是我都无法入睡。英男睡着了，妈妈睡下又披衣起来，取过了自己的琴和琴弓，忘我地拉了一曲又一曲，它们都是今晚一个美丽的女提琴手在音乐会上演奏过的，可在妈妈的琴弦上，这些乐曲却有了新的意蕴和魅力，不，它们是被融入了新的悲伤和欢乐、力量与梦想。我鼓足了勇气，对她说出了一晚上盘旋在心底的话：“阿妈妮，我想跟你学琴！”

妈妈惊讶地直视着自己的女儿，过了一会儿，她一把抱住我，用颤抖的声音问：

“英子，你真的喜欢音乐？”

“阿妈妮，当然是真的！”

“妈妈秋天就送你去上城里的音乐学校！”

“妈妈，我爱你！你是天下最好的妈妈！”我跳起来一次次亲吻妈妈，大声喊着。大连城里是有一所音乐学校。妈妈曾去那里代过课，这件事我知道。

这天夜里我和妈妈拥抱着睡在一起。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万众

瞩目下走上了舞台，用颤抖的琴弦演奏出了一支支动人的、仿佛来自天国的乐曲……睁开眼时，天已经亮了。

可是到了秋天，我却没能走进那所音乐学校。我病了。开始是低烧，接着就是幻听。

你肯定不知道什么叫幻听。现在已经没有人会患这种病了。今天的人们营养充足。幻听是这样一种病：你患上了它，你就不再是你，世界也就不是原先的世界了。风声雨声，海浪拍击礁石的轰鸣，岸边林涛从昼到夜又从夜到昼的呼啸，在你听来都是某种或高亢凌厉或沉蕴悠远的乐音，是这一支那一支你早就熟悉的乐曲，是一场场你曾在剧场里听到的辉煌无比的音乐会。不同的是世界成了一个剧场，一个舞台。你终日被包容浸润在这场广大无边雄浑壮丽的音乐会里，随着它的乐曲起舞飘飞。你自己也成了这场音乐会的主角，天地大海森林中涌来的音乐的主角。此外，你就再也听不到任何别的声音了。

现在想起来，当时我患那种病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营养。其后我们又在大连住了一年多，我的病断断续续，一直没有痊愈，虽然妈妈一直在为我攒学费，可我到底没能走进那所音乐学校。

1930年夏天，我十一岁，身体强壮了一点，妈妈又对我提起上音乐学校的事，她甚至带我去见了学校的校长。但命运已经不给我机会了。夏末的一个夜晚，我们已经睡下了，小房子的门突然被人急促地拍响。妈妈披上衣服把门打开，一个陌生的中国青年闯进来，神情急迫地说：快，快带上孩子跟我走，余下的话上了马车再说！

妈妈只在黑暗中迟疑了一秒钟，就带着我、英男和一个匆匆收拾起来的小行李箱，登上了等在门外的马车。陌生的中国青年亲自赶车，拉起我们风驰电掣般地狂奔而去。

这位陌生的叔叔就是中共大连城东区区委委员秋雨豪。当时秋叔叔才二十二岁。在飞奔的马车上，仍然没有暴露身份的他断断续续告诉妈妈，“光复社”在大连的组织已被破坏，再过一小时日本人就要在全城开始大搜捕，已有人告发妈妈是这个组织的重要首领。

天亮前秋叔叔将我们母子送到距大连几十公里外的一个小火车站。下了马车秋叔叔问妈妈有什么打算，还说如果没地方可去，他和他的“朋友”愿意为我们一家做出临时安排，以躲避日本人的追捕。妈妈神情冷静地谢绝

了他的提议。妈妈说：“不，大兄弟，你把我们救出来就够了，以后的路，我们自己往前走。”

两天后我们在奉天“光复会”秘密成员的帮助下安顿下来。我们出逃的当天深夜，大连城里所有“光复会”成员全部被捕，并立即遭到了杀害。

我们没能在奉天住多久。妈妈这时已成了日本特务通缉追杀的“要犯”，大连“光复会”组织被破获后，奉天的“光复会”组织也开始遭到破坏。事发前一天，一个冒冒失失闯进我们住处的朝鲜人引起了妈妈的警觉，她当机立断，火速带我和英男逃往了当时吉林省的省会吉林市。再后来，我们又辗转来到了哈尔滨，在朝鲜难民中住下来。

1931年8月，由于一份秘密文件落到日本人手里，流亡中国东北的“光复会”组织再次遭到灭绝性的破坏。我们家在哈尔滨与“光复会”的唯一联系人被杀害，妈妈和“光复会”的最后联系，被突然切断了。妈妈没有放弃寻找新的组织联系的努力，却发觉事实比她想象的还要坏：全东北的“光复会”组织已被日本人破坏殆尽。至少她想在短时间恢复与组织的联系，已经不可能了！

一个月后，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接下来短短几个月，日本人迅速占领了包括哈尔滨在内的东北主要大中城市和交通线。大批日本特务随着日本军警涌入朝鲜难民聚居区，捕杀从朝鲜国内逃出的反日志士和他们的亲属，引起了朝鲜难民的大骚动和大迁徙，他们纷纷涌出哈尔滨，沿松花江东下，辗转进入当时尚地广人稀的三江平原。一天晚上，刚刚离开做工的纱厂，妈妈就发觉自己被一个在大连时就怀疑是日本特务的瘦小男人盯上了。妈妈等那个家伙转身跑回去报告，马上带我和英男连夜逃出城，裹挟在一群和我们一样无家可归的朝鲜难民中间，迤逦向东行进。一个月后，终于在位于松花江中下游之交的格节县乌兰镇停下来，这里还没有日本人，镇外却聚居着大量不同时期来到的朝鲜难民。妈妈这时已无处可去，就带着我们，在难民区边边上搭了两间草房，暂时住下来。

最初妈妈肯定没有想到要在这里长住。她的心还在大连、奉天、哈尔滨这些大城市，仍然相信只有回到那里才能找到自己的“组织”。像所有意志坚定的爱国者一样，妈妈永远也不会相信自己的“组织”会被日本人一网打尽，更不相信自己 and 国内的爸爸的联系再也不能恢复。可是这年冬末，她先是大病了一场，紧接着，一位在朝鲜民族解放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人物走

进了我们家，她就是想走，也不能了。来人叫崔勇健，是朝鲜民族的一个大英雄，一位和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过的抗日斗士。他不是“光复会”会员，却参加了“光复会”的大起义，失败后只身流亡中国，投考广州黄埔军校，毕业时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前他来到中国东北，在朝鲜难民中从事反日活动。崔勇健叔叔那时有一个梦想：在流亡中国的朝鲜难民中组织一支规模浩大的义勇军，打回朝鲜去，光复祖国！

崔叔叔的落脚点就在我家。崔叔叔是一位革命者，妈妈也是一名革命者，他们仅凭最初的一席话就大致互相辨认出来了。开始崔叔叔只是说要在难民中办一个朝语学校，请妈妈帮助她。妈妈答应了。学校很快办起来，我和英男都成了他的学生，接下去，一个反日秘密组织在学校里成立。妈妈是这个新组织的第一批骨干成员，崔叔叔的得力助手，而崔叔叔也在这些日子里，知道了妈妈的真实身份和我们一家流落格节的经过。让妈妈感到吃惊和欢欣的是：多年来一直流亡国外的崔叔叔，居然知道我爸爸的名字！

“大姐，你真是朴雄哲朴大哥的妻子？真没想到，我能在这里遇见你 and 孩子们。朴大哥是我们朝鲜的民族英雄，不只是我，每一个流亡中国的朝鲜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大姐，兄弟在这里向朴大哥、也向你致敬！”

崔叔叔成了我们一家的亲人。他向母亲保证，由他负责帮母亲恢复和在国内的爸爸的联系。他让母亲带我和英男留在乌兰镇，等爸爸来这里接我们回国，或者由他安排人送我们回国和爸爸团聚。妈妈接受了崔叔叔的帮助，虽然直到这时，她仍然没有下决心在乌兰镇上长住下去。

1932年春天，占领了佳木斯的日军向西推进，格节连同乌兰镇相继沦陷。妈妈就是再想带着我们离开，也走不了了。

一批原籍格节的中国共产党员奉命返回故乡，开展反日斗争。有一天，崔叔叔将一个相貌清瘦的年轻男子引进了我们家。他还没有正式介绍客人和我们认识，妈妈和年轻男子先就惊叫起来。崔叔叔一脸惊奇地看着他们。没有人想到要对他做出解释。来人是秋叔叔，一年半前的那个深夜，是他用一辆飞奔的马车将我们母子三人从大连救了出来！当然，直到这时，妈妈和我才知道他的名字。

“秋雨豪。秋天的秋，雨水的雨，豪杰的豪。”崔叔叔说，“我的中国同志和朋友。”

“秋……兄弟，你怎么会来到这里？”妈妈高兴得泪都流下来了。与秋叔叔分开后，她一直没能忘记这位从日本人屠刀下救出过我们一家的恩人。

秋叔叔很年轻很灿烂地笑了。

“大姐，我就是乌兰镇人。我到这里来，是回我自个儿的家呀。”

秋叔叔一家马上就和我们稔熟起来。到乌兰镇几个月，妈妈和我举目无亲，可现在我们一下子就有了那么多“亲人”：秋叔叔和他年轻的妻子赵玉珠阿姨；秋叔叔的妹妹秋云姑姑。那时秋姑刚和汪大海结婚，头一次见面她就喜欢上了我，搂住我啧啧亲个不停，对妈妈说：

“大姐，让英子认我做干妈吧，我喜欢她！”

秋姑做了我的干妈。她还按照当地的风俗，给我扯了一身新衣服，让我穿上。

崔叔叔也向秋叔叔、秋姑讲了我们一家人流落格节的经过。妈妈积极投身于当地的抗日活动，出任了中共格节县委领导下的秘密组织全县妇女反日大同盟的委员长。妈妈对敌斗争坚决，做事干练，很快赢得了当地党的信任和尊敬。我们在镇外难民区里的家，也成了县委成员秘密聚会的主要场所。

可这时崔叔叔却要走了，上级让他东下中苏边境的虎林、饶河，在朝鲜人中进行新的反日动员工作。他在格节朝鲜难民中负责的工作交由一名非党人士——就是妈妈——承担。崔叔叔行前的那个夜晚，和妈妈进行了一次只有他们两人在场的秘密谈话。他告诉母亲：虎林、饶河靠近中朝国境，朝鲜人不少，说不定就有“光复会”在活动。不管是他，还是全东北的中共党组织，都会把我们的事放在心上。他到了那里，一旦联系到“光复会”的人，就会将我们现在的住址转告国内的爸爸。那时，就是爸爸不能来接我们回国，他和秋雨豪叔叔也会负责将我们送回国内去的！

第二天崔叔叔就走了。妈妈一直送他走了十多里路。他是带着妈妈和国内的“光复会”组织、带着与爸爸恢复联系的希望走的。他给我们带来的希望是那样巨大，于是我们一家三口在乌兰镇上的暂时的滞留，就变成了对已断绝联系的“光复会”组织和爸爸的坚忍的守望。妈妈、我、英男的命运，也因之彻底改变。

2

我还是先对你讲一讲乌兰镇所在的地理位置吧。它将是我今天开始讲给你听的这个漫长的故事展开的第一个场景，我生命的第二故乡。你想要知道它在何处，需要先在地图上找到松花江。松花江自长白山天池流下，奔向扶余，和嫩江汇合，是为上游；自两江汇合处向东，经哈尔滨至汤原、依兰，是为松花江中游；再从这里东流到同江，汇入黑龙江，流出境外，是为下游，当地人一般称之为下江。格节的位置正好在松花江中下游之交，小兴安岭的东麓，下江地区的西缘。东去百余里，便是天下著名的三江平原（三江指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向西百十里，便是茫茫苍苍的小兴安岭腹地，人烟稀少，原始森林一望无涯。格节县境分为南北两部，北部是小兴安岭的一部，崇山峻岭，深沟大壑，森林茂密；南部则是半山区，到了最南部，则几乎成了平原。一条格节河自小兴安岭密林深处发源，由北向南流过全境，在县城附近汇入松花江。乌兰镇不在南部的半山区，也不在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它正好位于北部山区和南部半山区之间，南去县城百余里，是格节中北部最大的镇子，有上百户人家，几千口人。

1932年春节前后，由于崔勇健、秋雨豪等一大批共产党员的到来，乌兰镇成了全县反日活动的中心。接着，这里又成了新成立的中共格节中心县委机关的所在地。崔叔叔走了，从哈尔滨、奉天甚至关内来的中共要人却接踵而至，我们家不知从何时起就变成了县委接待这些要人的秘密交通站。只是1932年一年间，妈妈就在家替县委先后接待了中共满州省委的主要负责人罗登贤、杨靖宇、周保中、赵尚志、赵一曼、李兆麟。而这些名垂东北抗日斗争史册的大英雄们也就从这时起知道了妈妈。

我自己也在乌兰镇一天天长大。走进乌兰镇时我还是个有病的孩子，我说的是幻听，由于离开大连后一直过着漂泊无定的生活，没有见好反而加重了。但是到了这里，由于生活暂时安定下来，另一方面，也由于我离开了城市的喧嚣，走进了辽阔的大自然之中，终日聆听着与城市音响全然不同的清新的音响，我那在城里求了多少医生也没有治好的痼疾居然不治而愈。格

节河两岸长卷一样展开在我眼前的景物、色彩、声音帮助了我。北满不像关内一样四季分明，差不多只有夏天和冬天两个季节。冬天刚过去，夏天就来了，树绿了，花开了，睡梦中还在结冰的河一下就成了明净的流水，阳光照耀着大河，水边的芦苇丛半浸在绿水中，无论是河面还是苇丛，一切都在闪闪发光，将人的眼睛、人的心也染绿、染亮起来，像这条突然变得汹涌浩茫的大河一样明丽欢乐；反之，夏天还没过去，几场秋风扫过，一场大雪袭来，大地就进入了滴水成冰的寒冬，山山岭岭，一片银装。朔风怒号，雪泡子一个接着一个在荒原上掠过，饿急了熊涉过茫茫雪原，从深山里直走到山脚下人家的院里，偷吃圈里的小猪……最初的日子里，我仍能从耳畔听到许多别人听不到的声音，那一场场缭绕不去的音乐会，可是我渐渐地发觉自己听到的声音变了，它仍然是一些乐音，却已不是来自幻觉而是真实的世界，来自格节河和广大山林里的自然的音响了。风声雨声，虫鸣蝉噪，拂晓时河水的流淌，清晨屋后林木的摇曳，夜半野草拔节的脆响……所有这一切，都是悦耳动人的，真实的。终于有一天，我发觉自己全好了，我听不到那些过去在妈妈的乐团后台上听过的音乐会，也听不到那一场我在大连的剧院里欣赏过的激动人心的音乐会了，我现在听到的，只是每个人都能在任何平常的白昼和夜晚听到的自然的音响，是大自然恩赐给每个人的一场永无休止的音乐会。我这个一直病蔫蔫的孩子，也成了健康的孩子了！

妈妈为我恢复正常的听觉喜欢得流下了眼泪。可关于送我去读音乐学校的事，她离开大连后就一次也没有再提起。1933年冬，我在乌兰镇上读完了五年制小学，回到家里帮妈妈照看英男（从小时起我就开始帮她带英男，这个弟弟几乎是我带大的），她不在的时候留下来照看家。一般情况下，妈妈既不让我知道更不让我参与他和叔叔阿姨们的斗争，但遇到一些特别危急的情况——这种时候不多——她有时不得已也大着胆子让我为县委的叔叔阿姨们送过情报。生活在妈妈身边，就是她和叔叔们有意避开我，他们做的事我也仍然略知一二。我渴望为妈妈做事。长期营养不良让十四周岁的我个头还比不上一个正常发育的十二岁的孩子，在别人眼里我就比自己的实际年龄更小，我再把捡煤核的篮子往胳膊上一挎，脸上抹两把烟灰，走到哪里，这么个邋里邋遢的孩子都不会特别引起日本兵的注意。我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呢：爸爸妈妈的日语都很好，流亡中国后为避免被日本特务注意，父母在家里也只说日语，我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从小就能听懂日本话。送情报的路